

中 国 现 实 经 济 热 点 问 题 系 列



中国经济 内外均衡问题研究

A Research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 of China Economy

王远鸿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中 国 现 实 经 济 热 点 问 题 系 列



中国 经济 内外均衡问题研究

A Research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 of China Economy

王远鸿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内外均衡问题研究/王远鸿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096-0833-3

I . ①中… II . ①王… III . ①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5779 号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010)51915602 邮编：100038

印刷：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徐 雪

责任编辑：徐 雪

技术编辑：黄 铢

责任校对：郭 佳

720mm×1000mm/16

16 印张 305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书号：ISBN 978-7-5096-0833-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68022974 邮编：100836

前 言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关注的是内部均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追求的是经济高增长、物价基本稳定、就业增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部平衡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政府由追求内部均衡的单一目标转向追求内部均衡和外部平衡的双重目标。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取得了较快发展，进一步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全球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工环节纷纷向中国转移，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加。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高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内外经济联动性的加强，外需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日益加大，一方面，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内外需失衡、内需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和资本流入的不断加快，中国经济也出现了明显的外部失衡问题，集中体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受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改变、收入分配日益失衡、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内部失衡也在不断加剧，突出表现为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中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的不断加剧，不仅导致国内产业结构进一步恶化、国内资源的浪费和枯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损害了国内居民的经济福利，加大了国内经济和金融风险，而且加剧了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力。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状况产生了巨大冲击，给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本书选择以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研究为题目，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表现、成因进行归纳分析，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冲突和宏观调控成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得失进行了判断。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犹存，中国经济复苏之路布满荆棘，全面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冲击，研判后危机时代全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展望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前景，对于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2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0
第二章 经济内外均衡相关理论和分析框架	13
一、开放条件下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	13
二、开放条件下经济内外均衡的冲突	29
三、开放条件下经济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调节	37
第三章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主要表现和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52
一、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	52
二、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	72
三、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相互关系的实证检验	86
第四章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成因与风险分析	92
一、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成因分析	92
二、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成因分析	118
三、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风险分析	131
第五章 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冲突与宏观调控	135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冲突	135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解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实践	142
三、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159
第六章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前景	174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产生巨大冲击	174

二、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前景	189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前景	204
第七章 后危机时代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对策	218
一、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总体思路和原则	218
二、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短期对策	223
三、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中长期对策	229
参考文献	244
后记	250

第一章 导论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关注的是内部均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追求的是经济高增长、物价基本稳定、就业增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部平衡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政府由追求内部均衡的单一目标转向追求内部均衡和外部平衡的双重目标。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取得了较快发展，进一步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全球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工环节纷纷向中国转移，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高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内外经济联动性的加强，外需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日益加大，一方面，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内外需失衡、内需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和资本流入的不断加快，中国经济也出现了明显的外部失衡问题，集中体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受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改变、收入分配日益失衡、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内部失衡也在不断加剧，突出表现在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中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的不断加剧，不仅导致国内产业结构进一步恶化、国内资源的浪费和枯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损害了国内居民的经济福利，加大了国内经济和金融风险，而且加剧了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力。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状况产生了巨大冲击，给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本书选择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研究为题目，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表现、成因进行归纳分析，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冲突和宏观调控成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得失进行了判断。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犹存，中国经济复苏之路布满荆棘，全面分析国际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冲击，研判后危机时代全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展望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前景，对于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1. 西方经济学界对内外均衡问题的研究

(1) 内外均衡概念的演变。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概念最早是于1951年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德 (James Meade) 提出。随着人们对经济运行认识的改变，对内部均衡的界定和理解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米德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是指国内经济处于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内部均衡概念进一步解释为菲利普斯曲线上的某一个最优点，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的最优组合点。6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费尔普斯 (Edmund Phelps) 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内部均衡就是指国内的失业率水平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状况。总体来看，一般将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归为内部均衡目标。

外部均衡的具体内涵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国对资金流动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经常账户的逆差很难通过汇率变动或吸引资本流入的方法加以解决，因此，这时外部均衡通常被视为经常账户平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汇率可以自由浮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可以依靠外汇市场来自发调节或弥补经常账户差额，外部均衡被视为总差额的平衡。80年代以来，外部均衡的含义又有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资本在国际间自发流动导致汇率剧烈波动，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频发，因此，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条件下，总差额的平衡并不能说明问题，一国仍有必要对经常账户乃至整个国际收支的结构进行控制；另一方面，理论研究的深入使人们认识到简单要求经常账户达到平衡常常是不必要的，一国应利用经常账户可以调节储蓄与投资差额等性质，根据经济的不同特点、不同发展阶段确定相应的经常账户余额目标，并进而确定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国际收支均衡总目标被分解成若干子目标，于是经常账户差额、贸易账户差额、资本与金融账户差额以及外汇储备等均被列入外部均衡目标的范畴，外部均衡可以定义为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不是短期的各项目收支平衡的概念，而是长期的、动态的各项目收支差额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2) 内外均衡相关理论。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是随着经济逐步开放而出现

的，对内外均衡问题的研究也是随着开放程度的增加而逐步深入的。早期的国际收支理论，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外部失衡的问题。1951年米德（James Meade）在其代表作《国际收支》一书中，首次直接、较完整、较系统地提出了内外均衡关系理论。米德认为如果一国只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其经济政策目标有两个：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他认为要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可选择的经济政策有三种：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价格调整政策（包括工资和汇率政策）和直接控制政策（包括数量控制和各种管制政策）。在外部经济出现失衡时，若只能采取金融政策或只能采取价格调整政策，要达到内外均衡，将会发生政策冲突（后来被称为“米德冲突”）。要避免政策冲突，政府应该运用政策搭配的方法来影响经济，从而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

1952年，米德和亚历山大（S.S.Alexander）提出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该理论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认为国际收支与整个国民经济相关联，只有理解经济政策怎样影响总的经济活动关系，尤其是理解了产量变化以后，支出如何变动，才能理解国际收支的变动。根据凯恩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恒等式： $Y = C + I + G + (X - M)$ ，式中 Y 、 C 、 I 、 G 、 X 、 M 分别代表国民收入、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购买支出、出口和进口，其中将 $(X - M)$ 用 B 表示，将 $(C + I + G)$ 用 A 表示，称为吸收，反映本国居民的支出，由此就有： $B = Y - A$ 。吸收理论认为，国际收支盈余是吸收相对于收入不足的外在表现；相反，国际收支逆差是吸收大于收入的外在表现；只有当国民收入等于吸收时，才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当国内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国内需求旺盛，如若超出本国的供给能力，则需要增加进口来弥补供求缺口，此时 $B = Y - A < 0$ ，即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缩小甚至出现逆差，同时也会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生产，提高供给能力，因而资本项目会出现顺差；相反，当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国内需求不振，于是进口减少，出口增加，此时 $B = Y - A > 0$ ，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缩小或出现顺差，而资本项目则会出现逆差。

米德的《国际收支》发表后，以后的经济学家对他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952年，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指出了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被称为“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 Rule）。“丁伯根法则”指出：要实现多个宏观经济目标，政府必须拥有等于或多于目标数的政策工具。1968年，罗伯特·蒙代尔进一步分析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的对应关系，提出了“蒙代尔政策指派原则”（Mundell Assignment Rule）或“有效市场分类原则”（Principle of Effective Market Classification）：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指派各种政策工具，将每个政策工具都应用于它有着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进而，蒙代尔提出了将财政政策应用于实现内部均衡目标，货币政策应用于实现外部均衡目标，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来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蒙代尔模型。

斯旺 (Swan, 1960) 和索尔特 (Salter, 1959) 提出用支出转换型政策 (汇率政策) 和支出增减型政策 (财政和货币政策) 来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模型。他们指出, 如果外部均衡曲线斜率的绝对值小于内部均衡曲线斜率的绝对值, 则汇率政策对外部均衡、财政货币政策对内部均衡有较大的影响力, 以汇率政策对外, 财政货币政策对内, 就能逐步实现内外均衡目标, 否则, 将离均衡目标越来越远。奥特兄弟 (David J.Ott and Attiat F.Ott, 1968) 研究认为财政、货币政策分别用于调节内部和外部均衡的分配并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怀特曼 (Marina V.N.Whitman, 1970) 则强调了政策搭配的复杂性。

20世纪60年代初, 蒙代尔不仅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来考察在固定汇率下如何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同时实现经济内外均衡, 而且运用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 将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引入了封闭的IS-LM模型之中, 拓展成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模型, 以此来研究开放经济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几乎同时, 弗莱明 (Fleming, 1962) 也对开放经济下的稳定政策进行了类似研究。他和蒙代尔共同构建的分析模型称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Mundell-Fleming Model), 该模型的基本结论是: 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 因为利率与汇率保持相对稳定, 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投资进而影响产出水平的货币政策受到严重削弱; 而利率稳定消除了挤出效应而使财政政策有良好的效果。相反, 在浮动汇率下, 货币政策成为有力的工具, 而财政政策效果削弱。因此, 政府可以通过相机地选择汇率制度或其他经济政策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已成为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和政策搭配的重要分析工具。此时,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调控理论基础逐渐成形, 从而形成了“开放宏观经济学”这一影响很大的流派。

在20世纪70~80年代初, 西方各国陷入滞胀,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重点是对付国内高通胀、高失业, 外部均衡目标相对被忽视。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 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及其诱发的国际资金流动自发调节国际收支, 将汇率作为开放经济的核心变量, 从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中把握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布莱克 (Black, 1985) 对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行了修正, FLMA模型 (弹性价格货币模型, Dornbusch, 1976) 即汇率超调模型, 多恩布什继承和发展了蒙代尔、弗莱明的研究, 将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调整速度不一致的汇率超调模型 (Exchange Rate Overshooting Model) 纳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之中, 解释了浮动汇率制下各国汇率水平剧烈波动的原因, 完善了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 被称为“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传统” (Mundell-Fleming-Dornbusch Tradition)。资产市场均衡模型 (Branson, 1977; Dornbusch and Fisher, 1980) 说明在资产不完全替代的情况下,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

作对内外均衡的影响。货币替代模型 (Calvo and Rodriguez, 1977; Frenkel and Rodriguez, 1982) 说明在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不完全替代的情况下, 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这一系列汇率理论模型, 即“汇率动态学”的汇率理论旨在研究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性债务危机爆发, 特别是90年代货币危机频繁爆发之后, 人们发现单纯依靠汇率调节内外均衡是不可能的, 在国际资金流动的历史条件下, 内外均衡的冲突更加严重, 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也大大加深, 必须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来实现各国经济的内外均衡。美国经济学家查德·库柏 (Richard Cooper) 早在60年代就开始研究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 他提出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库柏指出: 在各国经济依存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 针对某项目标的经济政策, 通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关联), 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这种效应又会反过来影响本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原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不同的溢出效应由于作用方式不同, 彼此之间也不能相互抵消, 因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十分重要。他的结论是: 各国间的政策协调, 能极大地提高各国福利, 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哈马达 (Hamada, 1976)、米勒和萨曼 (Miller and Salman, 1985) 等则引入博弈论分析国家的经济政策策略, 并证明了国家间的相互合作能带来额外收益。而麦金农 (McKinnon, 1984、1988)、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85)、克鲁格曼 (Krugman, 1991) 等人则提出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具体方案或机制, 如威廉姆森 (Williamson) 和克鲁格曼 (Krugman) 等人提出了汇率目标区理论, 旨在为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寻找一种机制。奥布斯特菲尔德 (Maurice Obstfeld) 和罗哥夫 (Kenneth Rogoff) 将私人部门的跨时效用最大化引入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体系中, 建立了一个结合私人部门效用分析、资产市场和商品市场调整速度差异、完全的资本流动三者于一体的宏观经济模型, 试图给凯恩斯主义的开放宏观经济学创建一个微观经济体系。澳大利亚经济学家伯金斯 (Perkins, 1991) 将蒙代尔政策指派法则运用于一般性的经济政策分析, 建立了一个三目标 (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经常账户均衡) —三工具 (财政支出、税收政策、货币政策) 的分析框架。

2. 国内经济学界对内外均衡问题的研究

(1) 对内外均衡的定义。在西方经济理论中, 经济增长并不直接包括在内部均衡的目标中。部分中国学者采用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如姜波克将内部均衡定义为, 在一特定的价格水平上, 实物领域中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 同时金融领域中货币总供给和总需求也平衡。黄盛华将内部均衡定义为当一国生产性资源被充分利用并且价格水平稳定时, 该国经济处于内部均衡状态。

有的学者认为内部均衡定义为经济在潜在产出的水平上，即经济稳定增长，不考虑就业，因为中国人口庞大，不可能充分就业。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内部均衡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就业提高和物价稳定等内容。如陈信华将内部均衡定义为当提高了就业率，保持了国内物价稳定和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时，就实现了内部均衡。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也应将收入公平分配、经济结构协调等看作内部均衡的目标。

在外部均衡的定义上，尽管有分歧，但多数经济学家将国际收支的平衡作为外部均衡的重要指标，如姜波克认为：“外部均衡是指在国内经济均衡发展，内部均衡实现基础上的国际收支均衡。”“所谓国际收支平衡，是指国内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下的自主性国际收支平衡，即国内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自主性国际收支平衡。”

(2) 内外均衡对立统一关系研究。国内经济学界在米德冲突的基础上，对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形式做了许多拓展性的研究，代表性人物为姜波克、黄盛华等。米德在分析内外均衡矛盾时，针对的是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情况，并没有考虑资金流动对内外均衡问题的影响。在浮动或管制汇率制下，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加复杂，内外均衡目标冲突更为加剧。而巨额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直接影响各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和发展，使各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受到更多掣肘，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更加困难。根据内外均衡状况的不同组合，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冲突可表现为更为复杂的形式。

对内外均衡的统一关系的研究，多着眼于宏观经济国民收入账户(National Accounts)、国际收支账户(Balance of Payments Accounts)、资金流量账户(Financial Flows Accounts)三个流量报表所反映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平衡方程式，如黄盛华、陈信华以及后来的一些学者在这些方面做了有关推导。

(3) 关于中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的研究。2006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国内学者对内外失衡的背景、特征、成因以及治理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详细论证。

1)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背景。李晓西认为中国经济内外发展不平衡有着深刻的现实和历史背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的大国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资源性产品出口影响国，并影响到全世界，欧美、亚洲等国家对中国快速地和平崛起都在议论纷纷。第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包括技术革命的快速化、各国经济的紧密化、经济制度的一体化。第三，国际经济的多极化，所谓多极化就是战略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力量对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批新兴国家上台，一批老的大国之间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国际间、区域间合作不断强化，其表现为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区域化。

2) 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是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哈继铭认为,国内经济失衡的主要矛盾就表现为高储蓄。储蓄率太高是中国经济最根本的问题。中国储蓄率高是和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明显,国企改革带来教育、卫生、退休保障由个人负担,房地产价格上涨得太快和政府财政重投资轻消费等相联系的。一个国家的储蓄只要能转化为正常的有效率的投资,就是正常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储蓄。

汤敏指出:中国高储蓄问题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过高。企业储蓄率高是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国企不分红以及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中国的企业储蓄一直较高。中国高储蓄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储蓄率高。中国政府储蓄占GDP的6%左右,这个比例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很大的。

国内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无论是投资增长过快、信贷过多还是顺差过大,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储蓄率过高、消费率不足才是导致当前诸多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本结构性原因。而进一步探寻,则要追溯到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的缺陷上。

中国消费不足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穷人消费不起,富人不消费。樊钢指出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低是因为中国人没钱。美国人均GDP接近4000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低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钱消费,尤其是农民。中国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中国农民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消费了,教育、医疗、住房还没有着落。崔之元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和要素价格不合理是国内需求不能拉动、消费不能提高的最根本的制度性因素。工人名义工资没有上升,实际工资在下降,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提高,消费能力也无法提高。

内外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陈东琪指出,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一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是7亿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善。尽管经济年增长10%左右,人均GDP也是快速增长,但是国民福利的增进并没有与此相协调。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尤其是中国的二、三类城市的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改善。

由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的结构失衡日益显现。王小鲁指出,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各种途径向少数人集中,引发了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林毅夫指出,中国资源税费极端不合理,“两高一资”企业并没有承担其应担负的社会成本,这也是中国目前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症结之一。企业垄断、房价高涨等都压榨了其他行业的利润,进一步造成分配不均。

3) 部分不合时宜的体制政策加剧了内外失衡。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发展和就业，中国选择了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功表明我们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国际环境变了，国内经济环境也变了，部分不合时宜的体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的内外失衡状况。

①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造成流动性过剩，恶化了央行资产结构。由于外汇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多，但同时又要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央行被动吃进了很多外汇而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多于实际的基础货币需求量，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可能会引发经济过热、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在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中，外汇成了央行目前的主要资产。2005 年大概占央行全部资产的 60%，据张曙光估算，在外汇储备达到 20000 亿美元的情况下，外汇资产在央行的资产结构里就会占到 80%，而央行的负债则全部是人民币资产， M_2 有可能在 62 万亿元到 68 万亿元之间。

多余的流动性需要由央行主要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来对冲掉。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有可能引发通货紧缩，过大的对冲压力也造成了央行资产结构恶化，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内外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也是形影相随的，外汇储备的过度积累不单是一个储备问题，还会影晌国内的经济发展，对国内经济结构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②出口导向的外资与外贸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内外失衡。在外贸政策上，中国一直实行奖出限入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外汇的短缺，各级政府都认为多出口、多挣外汇好，这种惯性思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扭转。余永定认为，改革开放初期，鉴于拉美债务危机，我国采取积极引入 FDI 和积极出口创汇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提高中国在全球中进行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但是现在环境不同了，结果是我们国内大量的资金得不到利用。外资进入中国，从实质上来讲只不过是中国储蓄的回流。中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不断支持美国的经常项目的逆差，使国际收支结构的不平衡得以维持。

4) 内外失衡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增长方式问题。中国有 13 亿人口，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很多问题最后都转化为就业问题以及增长问题。为了实现发展和就业，中国近年来选择了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但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国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种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是否还合适、能否持续下去，值得我们反思。吴敬琏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内外经济失衡等问题，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中国目前这种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因此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才是根本出路。

5) 内外失衡的治理。余永定认为“双顺差”是当前我国经济内外部失衡

的集中表现，双顺差已经并且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中国连续 15 年的双顺差是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均衡相联系的。为了纠正双顺差，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速，应该考虑的政策包括：增加社保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通过财政和其他手段（如法律、法规），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收入差距。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制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对内、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为引入外资而进行恶性竞争。张曙光认为目前中国经历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已经埋下了巨大的潜在经济风险。这种情况的形成，是由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且主要责任在美国。但是，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目前它并没有调整的意愿，而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发生断裂，美国的损失可能不会太大，它也承受得起，而我国的损失可能很大，我们则承受不起。所以，及早和逐步加以调整，从而减少风险和损失，是十分必要的。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源在增长方式，要转变增长方式，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刘煜辉认为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要从根本上摆脱这一内外失衡的格局，就必须坚定地加快实施经济转型战略的步伐，由外需主导转向内需主导，这是大国经济和未来经济主导权的必然选择。

（4）实现我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政策协调问题研究。在西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与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实现我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政策协调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其代表人物为姜波克，他在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搭配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对政策搭配理论做了一定的拓展，如《开放经济下的货币调控和政策搭配》、《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搭配研究设想》等，提出了开放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采取政策搭配的方法，分析了宏观调控工具创新对增强政策搭配有效性的作用。他所著的《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以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内外均衡为分析的核心，着眼于金融领域，深入探索了能够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政策搭配方法，是国内该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其他学者所做的研究还有，郭庆旺、赵志耘、何乘才进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博士论文研究中国政策搭配问题，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5）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研究。

1)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影响的研究。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 2006~2007 年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的大热点。众多的国内经济学家，就这一问题发表见解。主要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定义、原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黄达主编的《全球经济调整中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系列研究报告、《国际经济评论》2006~2007年有关各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编著的《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经济发展》一书中。

2)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研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众多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进行了研究。由于成果众多，仅列其中几部，如纪宝成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09——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经济稳定与增长》，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编著的《全球衰退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2009》，袁志刚主编的《全球金融风暴与中国经济》等。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 研究思路

为了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本书在充分收集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为基础，梳理了与内外均衡相关的理论和分析模型；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四大指标的演变情况，重点分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主要特征和成因，选择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模型和“双缺口”模型作为分析内外失衡原因和相互关系的主要模型，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对中国内外部失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内外均衡冲突和宏观调控的情况，运用状态空间（变参数）模型方法建立中国动态 IS-LM-BP 模型，对内外失衡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模拟；全面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冲击，研判后危机时代全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展望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前景；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总体思路和原则，并给出了短期和中长期对策。本书共分为七章，除第一章导论外，结构如下：

第二章是经济内外均衡相关理论和分析框架。首先，从经济均衡概念演变入手，探讨了经济内外部均衡目标与界定、内外均衡目标的内涵、内外均衡目标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内外均衡目标。其次，考察了开放条件下三种不同形式的内外均衡冲突，并重点分析总结了内外均衡冲突产生的原因。在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内外均衡除了受到国内经济体内部的自发扰动影响外，外国经济变动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开放经济体之间，冲击传递存在着贸易性渠道、金融性渠道、政策性渠道和预期性渠

道。最后，总结分析了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调节的原则、政策调节的工具和政策调节的经典模型。本章为后面几章进行的模型推导和定量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文献支持。

第三章是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主要表现和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首先，分阶段考察了1978年以来，内部均衡指标的变化情况，重点分析了内部失衡的主要特征。其次，考察了1978年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差额的演变轨迹，重点分析了外部失衡的主要特征。最后，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内外失衡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内部失衡不断加剧是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存在反作用的结论。

第四章是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成因与风险分析。首先，从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收入分配失衡不断加剧、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和对公共产品供给缺失三个角度分析了内部失衡的原因。其次，从出口导向政策弊端日益显现和全球经济失衡不断加剧两个方面分析了外部失衡的原因。最后，简要分析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不断加剧的风险。

第五章是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冲突与宏观调控。首先，考察了1993~2008年间三次内外部经济均衡冲突的不同表现形式，宏观经济调控所面临的政策困境。其次，重点考察了三次内外均衡冲突期间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政策成效，并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评价。最后，利用变参数模型方法构建中国的IS-LM-BP模型，对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进行定量分析。

第六章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内外均衡的前景。首先，从外贸进出口、实际利用外资、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等方面，全面考察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巨大冲击。其次，从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动力、政治经济秩序等方面分析了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将面临的深刻调整，并得出世界经济将在调整中恢复、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再趋活跃、全球经济不平衡状况趋于缓和的结论。最后，从世界经济调整带来的新机遇、国内需求拓展的空间广阔、国内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体制效应还有进一步释放潜力等方面分析了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全面分析了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并得出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步恢复到潜在增长水平、物价水平将逐步回升、内外失衡状况将有所缓解的结论。

第七章是后危机时代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对策。首先，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总体思路，提出了“进一步增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协调能力，继续将内部均衡目标放在宏观调控优先位置，不失时机地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审慎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的四项原则。其次，提出了在短期内应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